

· 专题讨论 ·

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巴西战略伙伴关系

[编者按] 2009年8月10日,为纪念中国与巴西建交3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与巴西驻中国大使馆联合举办的“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纪念中巴建交35周年”研讨会在拉美所会议室召开,拉美所所长郑秉文与拉美所国际关系室主任、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双荣共同主持了会议。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体以及巴西驻华使馆、巴西企业驻华机构的共7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就中巴关系35年回顾、中巴关系现状与发展机遇、国际制度的变革与新兴大国的崛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沟通。与会代表还表示,中巴关系的迅速发展及良好前景将为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巴西研究中心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在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共同推动中巴关系的发展。本刊特设此专题,以反映这次研讨会的思想成果。

中巴建交35年的发展历程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

陈笃庆

(一) 中巴两国建交,两国友好关系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1974年3月,埃内斯托·盖泽尔总统就职后,就决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探讨建立两国关系的可能性。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邀访问巴西,双方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15日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友好关系史开始了新的篇章。两国关系35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双方关系的磨合期(1974~1984)。建交之初,双边交往不多,建交当年贸易额只有1740万美元。当时,中国还深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巴西仍处在军政府统治下,十分封闭,担心中国向巴西输出革命。但是,发展双边关系的大趋势已然不可逆转、毋庸置疑。时任巴西外长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认为,中巴两位巨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前进缓慢,但步伐坚实、不会停歇。1982年3月,巴西外长萨赖瓦·格雷罗访问中国。1984年5月,若昂·菲格雷多总统实现了巴西国家元首历史上首次访华。同年8月,在两国建交10周年之际,吴学谦外长访问巴西,双方就在圣保罗和上海互设总领馆达成了协议。

2. 两国关系开始稳步发展时期(1985~

2002)。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85年3月巴西恢复民主政府,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机遇。1985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巴西。同年底,巴西众议长乌利塞斯·吉马良斯访华。1988年7月,若泽·萨尔内总统正式访华。1990年,杨尚昆主席访问巴西。1992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发大会并顺访巴西。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和江泽民主席先后访问巴西,与巴方高层探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5年,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访华,确认了上述关系。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以及巴西政府从1994年起实施稳定经济的“雷亚尔计划”,双边经贸往来开始增加。

3. 双边关系迅速发展的阶段(2003年至今)。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了实质发展,并体现在诸多领域。自本世纪初,尤其是在2004年卢拉总统和胡锦涛主席成功互访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日益密切。双方签署的声明提出了指导双边关系发展的四项原则:(1)坚持平等协商,增强政治互信;(2)坚持互惠互利,扩大经贸往来;(3)保持磋商协调,加强国际合作;(4)推动民间交往,增进相互了解。两国还成立了中巴高层协调与

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巴西战略伙伴关系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合作委员会。2006年3月,阿伦卡尔副总统和吴仪副总理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了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双方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目前会议成果正在具体落实中。动植物检疫、科技、信息产业、文化和教育等分委会会议已分别召开或即将举行。双方正积极筹备召开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两国财政部也开启了对话。2006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巴西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巴西众议院签署了建立交流机制议定书,标志着中巴议会关系进入了实质性合作的新阶段。8月,巴西总统卢拉到北京出席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2009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巴西。5月,卢拉总统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深化合作的协议,成果丰硕。近年来,胡锦涛主席和卢拉总统还在多边场合频繁会晤,充分体现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高度政治互信。

中国与巴西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双边关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和巴西,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国际讲坛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巴两国已多次被邀请参加8国集团和5个发展中大国(G8+5)的对话,并一起参加G20华盛顿和伦敦金融峰会,在事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南南合作、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贫困、多哈回合谈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持相同或相似的立场。

(二) 中国与巴西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1974年至今已有35个年头,中巴关系的发展令人十分满意,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1. 在政治上,中巴是互信的战略伙伴。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外交部政治磋商机制运行良好,并已成功举行了14轮磋商。2007年4月9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访问巴西,双方商定建立战略对话机制,表明两国政治关系迈向更高层次。2007年11月,两国在北京举行了首次战略对话,在互信的基础上就双边关系及一些国际问题交换看法,为深化合作创造了条件。

2. 在经济上,中巴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双方有很大的经济互补性。双方合作基础雄厚、潜力巨大。巴西是中国在拉美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同样是巴西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97亿美元,大大超过原定在这一年实现200亿美元的目标。按中方统计,2008年两国贸易总额高达485亿美元。从2003年

起,两国贸易额年均增长30%以上。令人欣慰的是,贸易产品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巴西生产的ERJ145和ERJ190支线飞机和其他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受到中国市场青睐。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子和通讯产品也在巴西市场受到欢迎。两国企业双向投资额和数量不断增长,引人注目。恩布拉科冰箱压缩机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淡水河谷铁矿砂公司、巴西矿冶公司和万高电机公司都在中国取得骄人业绩。华为技术、中兴电讯、格力空调、嘉陵集团等也在巴西建立了分公司。中石化在巴西承建天然气管道项目。中信集团与巴西电力公司合作,承接南里奥格兰德州坎迪奥塔火电站部分建设项目。这两个项目均得到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

中巴两国总人口已超过15亿,占世界人口约23%,而两国贸易额却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这与两国的实力与潜力相比,是很不相称的,说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两国之间的相互投资还很有限,需要双方的企业更具创造性和进取心。巴西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的进取性还不够,应该充分发挥它们自身的优势。2008年7月,巴西政府部门联合发表了“中国议程”,决心推动巴西企业在中国市场参加竞争,争取到2010年,把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到300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巴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巴西政府推出了“加速发展计划”,并欢迎外国投资参与建设,相信中国企业可以在巴西找到发挥的空间。

3. 两国在文化、科技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也十分密切。两国人员交流、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对增加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4年,巴西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国。2008年7月和9月,我代表中方分别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校长和巴西利亚大学校长就在两校建立孔子学院签署了协议。孔子学院的建立将为加强中巴文化交流,推进两国人民了解、理解和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巴西民众学习汉语的热切要求。中巴两国不少省、州和城市之间签订了友好协议,为双方的人员往来与经济贸易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4. 两国在空间领域的合作,开发展中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先河,堪称典范。1988年7月,中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开展卫星领域合作的协议,共同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经过双方科技人员的

努力，1999年10月发射了第1颗卫星，第2颗和第3颗卫星分别于2003年10月和2007年9月发射成功。目前，双方人员又投入第4颗和第5颗卫星的研制工作。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在两国的国土资源调查、城市规划、环境监测、减灾防灾、农林业生产、水利建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中巴两国还为南美洲和非洲国家免费提供卫星图像和数据，能有效帮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

（三）近年来巴西各界更多地关注中国

2006年4月，我第四次到巴西，任中国驻巴西第九任大使。与以往相比，我感到，巴西各界对中国的关心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在任职的3年中，先后应邀到全国不少州的商会、工业联合会、大学、研究机构以及高等军事学院作报告，介绍中巴关系，介绍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高速发展的原因，介绍中国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等。2008年4月中旬，巴西外交部下属的亚历山大基金会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大型“中国专题研讨会”，巴西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资深外交官、记者等各方面人士近500人出席。巴西外交部负责人期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推动各界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两国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巴西各界越来越感到，中巴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好伙伴。关于中国和巴西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巴西舆论曾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浪漫的，认为中巴一旦联手，在国际上将无所不能。第二种是悲观的，认为将损害巴西利益。上述两种看法都不符合事实。第三种看法认为两国可互为补充，一个坚实稳固的伙伴关系会带来双赢，两国都将从中获益。非常明显，伙伴关系不可能以损害一方为代价而由另一方独享好处。可喜的是，这种正确看法正

逐渐成为主流。

有些人对双方贸易中出现的一些小摩擦感到担忧。而我认为，摩擦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只有交往频繁了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事实上，存在争执的产品数额很小，还不及中国对巴西出口额的1%。作为友好国家，完全可以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公平合理原则，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进行充分的沟通加以解决。我认为，中巴两国企业界应该致力于创新和开发潜力，不断优化经贸结构、寻求发展高科技和高附加值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应该鼓励扩大相互投资，并将它作为中长期优先目标加以推动。

回顾两国关系的历程，我们有许多理由感到满意。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建立稳固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承认，两个国家间的相互了解还是很不够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进。双方存在不同点或分歧是正常的，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协调和相互理解至关重要。同时，双方需要鼓励和开拓更多渠道，让两国民间尤其是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通过开展文化、人文交流等，注入文化元素，培养包容共赢的社会心态，让伙伴关系更加持久。

总之，中国的发展为巴西提供了机遇，反之亦然。在当前新的世界格局下，巩固和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加强亚洲与拉美合作、推动解决全球性问题、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设和谐世界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驻巴西前大使，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主任）

巴中关系 35年回顾与展望

克洛多瓦尔多·胡格内

2004年以来，是巴西与中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卢拉总统访华两次，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一次。高层互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胡主席在巴西演讲时曾说过，“双边关系的发展达到

一个新的高度。”

（一）巴西与中国关系 35年回顾

在政治层面，包括总统和各级部长在内的高层交往和互访不断加强。中国和巴西之间没有历史性

分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双方不存在重大冲突,仅存的一些个案是可以通过对话解决的,这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创造了平台。通过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可以从长远角度出发分享对未来的立场和观点,即使出现小小的分歧也可以通过磋商和会谈加以解决。除了战略伙伴关系之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35年以来,巴西和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是新兴大国、“金砖四国”成员和G20成员国,是解决任何国际重大问题的中心国家,这使得巴中战略伙伴关系超过了双边的范畴。双方不仅在发展两国关系上是伙伴关系,并且能够为如何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克服经济危机共同提出意见。

在经贸领域,双方贸易的增长是令人瞩目的。35年以来,中巴贸易有起有落,其间两国不仅经历了内部的一些困难,还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巴西国内发生的经济危机,双边贸易曾发生过大幅后退。另一方面,在这35年中两国的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35年前,中国是巴西的基础产品出口国,主要是石油和煤炭;对中国来说,巴西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主要是钢铁。现在从巴西出口到中国的85%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四类产品:石油、铁矿石、大豆和一些化工原料产品。而从中国出口到巴西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如通信产品。

贸易摩擦是经贸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贸易摩擦往往会在经贸往来增长过程中出现,在这35年间,巴中贸易间的问题和困难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巴方,同时也在中方出现,比如铁矿石和大豆贸易。贸易困难可以通过磋商和对话来解决,中巴企业家委员会也可以对此发挥重要作用。但我要强调的是,巴中贸易结构的问题应当引起两国政府的关注。因为巴西目前是中国最主要的原料供应国,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品。这反映了巴中贸易的互补性,但是过于集中在初级产品上。而中国向巴西出口的是多种多样的工业化产品。这就会导致两个问题的产生。一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中国对巴西出口中获利最大的一方并不是进口的获利者;二是经贸问题——贸易的集中化,贸易主要集中于四大产品,一旦任何一种产品发生问题都会对双边贸易额产生巨大影响。据巴方统计,巴中贸易额达到了400亿美元,最近几年平均增长率达50%之高,这是可喜可贺的。

双边贸易结构的变化是双方经贸领域中需要注

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贸易额大幅下降。本次危机是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这期间,巴西对华出口持续增长,中国对巴西出口增速虽有下降,但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幅度小得多,这使得中国成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了两国关系是各自经济发展和克服经济危机的发动机。

在投资领域,尽管投资领域的合作非常少,但我们将会看到新一代的投资局面,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要到来。

在合作领域,双方正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如全球卫星合作。卢拉总统访华后,双方逐渐开始了新领域的合作。

在人文交流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的建立就是成果之一,这些成果同样还包括中国在巴西建立的孔子学院以及中巴关系研讨会等。

(二) 巴西与中国关系展望

未来35年中巴关系将怎么样?巴中两国被认为是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巴西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这个概念已上升为新兴大国。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将会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巴西在克服了国内的困难之后,从明年开始经济应该开始快速增长。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两国成为世界重大问题的阐述者,二是两国的共同合作将会发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巴中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分歧,因此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很多巴中代表团都表示,在G20集团内最好的伙伴关系将是巴中关系。现在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对全球的影响是35年前从未有过的,这为双方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也赋予了责任。双方应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一些小分歧,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我相信一定会解决的,因为我们两国的利益有很多共同之处,此外两国在安理会问题上不存在原则性分歧。

中国和巴西对国内和国际问题都有各自的改革议程。国内议程与发展中国家的性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关。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卢拉总统在200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与胡锦涛主席进行了一次私下会谈,对收入分配、农村改革、土地改革以及消除贫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对话透露出两国在公共项目、社会政策和改革政

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相似之处，这为未来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关系下，两国应加强关于公共政策、改革经验的交流对话。在国际问题上，包括银行、基金、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两国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卢拉总统访华期间，与胡锦涛主席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启动从

2010年到2014年为期5年的共同行动计划。对巴中关系而言，这一行动计划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我认为，在今后的35年，巴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将会取得比前一个35年更好的成绩。

(作者为巴西驻华大使，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发挥中巴企业家委员会平台作用 推动中巴经贸关系快速发展

苗耕书

(一) 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阔的经贸发展空间

中巴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双边关系。1993年，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巴西成为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2004年，胡锦涛主席同卢拉总统成功实现互访，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双边经贸关系也得到迅猛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巴双边贸易额在2008年达到485亿美元，同比增长63.2%，高于中国全球贸易17.8%的增幅。其中中国从巴西进口297.5亿美元，增幅达62.2%，也高于中国从全球进口18.5%的增幅。2008年中方逆差110亿美元，比2007年的69.61亿美元增长57.97%。2009年前4个月，据巴西贸易部统计，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巴西在此期间对华出口贸易额超过5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65%。与此同时，巴西对美同期出口下降了35%。

(二) 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的成立为双方企业搭建了良好的经贸合作平台

中巴企业家工作委员会(CBBC)是在中巴两国政府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由中巴两国企业家自发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中巴企业家委员会由中方委员会和巴方委员会两部分组成，其宗旨是加强中巴两国企业间合作，发展两国经贸关系。2004年5月24日，巴西总统卢拉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共同隆重宣布中巴企业家委员会正式成立。2006年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成立，中巴企业家委员会将

中方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并成为促进会重要的分支机构。

中巴企业家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在配合两国领导人互访、推动中巴投资贸易技术磋商等方面做了积极的工作。2004年11月，在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期间，委员会率领150余家中国企业随同访问，并成功举办了中巴经贸合作论坛和一系列专业投资贸易研讨会，为双边企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5年9月，委员会在北京饭店成功召开了“中巴经贸合作座谈会”。2006年3月22日，中巴企业家委员会在上海酒店举办了“中国—巴西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巴西副总统阿伦卡尔出席了论坛并致辞。2006年8月，委员会组织企业家代表团陪同吴邦国委员长出访巴西，并在巴西利亚组织召开了中巴企业家委员会年度会议，吴邦国委员长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2007年9月，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厦洽会)期间，委员会召开了年度工作会议和中巴经贸合作研讨会。这次会议为推动巴西政府推出“中国议程”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7月，中巴企业家委员会中方委员会协助巴西有关部委在北京召开了“巴西投资商机”研讨会，并与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国务秘书韦伯·巴拉尔一行，就中巴企业在能源、高科技、物流、农业、机电等领域的经贸合作进行了探讨与交流。2009年5月，在卢拉总统访华期间，中方委员会配合巴方组织会员参加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新机遇”研讨会。近年来，中巴企业家委员会还协助促成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巴西合资建设

氧化铝厂项目、山东兖矿集团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合作项目以及中巴 ERJ145系列涡扇支线飞机合作项目。同时为解决新兴铸管集团与巴西企业合作中的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巴企业家委员会积极推动会员企业开展对巴经贸合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石油天然气领域，2009年2月，中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习近平副主席访问巴西期间，与巴西石油公司签署了加强石油贸易及融资的合作备忘录，并签订了300万~500万吨原油进口协议。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帮助巴西建设全长1000多千米的天然气管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巴西开发深海石油资源提供信贷支持。在通信领域，中国企业华为公司自1999年在巴西成立子公司后业务发展迅速，目前已在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设立了3个办事处，拥有员工1136人，2008年在巴西销售额达到13亿美元，并在巴西市场全线产品领域占据领导地位。在航空领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巴西航空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并向我国多家航空公司成功交付27架ERJ145支线客机，成为中巴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在矿产领域，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早在1985年就在巴西投资设立了南美五金矿产有限公司，并在巴西市场取得了较好的发展。特别是2005年以来，该公司与中冶科工集

团合作，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共同承担了4个冶金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成套设备供货，其中3个已顺利投产。

（三）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中巴经贸关系不断发展

中巴企业家委员会的积极工作赢得了政府和业界的高度评价。2009年5月19日，胡锦涛主席在与卢拉总统会谈时，鼓励中巴企业家委员会要更好地发挥指导协调和牵线搭桥的作用。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亚洲和拉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完全符合两国的自身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009年7月，我代表中巴企业家委员会中方委员会与巴西驻华大使胡格内先生，就平衡巴西对华出口贸易结构、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巴西、推动巴西农产品出口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交流。

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通过双方企业界的相互支持与积极合作，中巴关系一定能取得长足发展，中巴企业家委员会也一定能在推动中巴经贸发展、促进双方企业合作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中巴企业家委员会中方主席）

国际制度变革与新兴大国的崛起

吴白乙

（一）国际制度的变革以及对未来的思考

一位不久前去世的学术前辈曾说过，“历史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分水岭，为历史划出阶段。”35年前，中国和巴西建交的时候，国际政治还处于冷战格局之下，然而世界经济则刚刚经历了两场“地震”。一个是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度崩溃，再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动了“能源战争”，引起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危机。

今天，在共同纪念中巴建交35周年的时刻，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分水岭上。全球资本主义在“石油美元”之梦破灭后再度陷入危机，世界经济迫切寻求带动未来增长的理

念、产业链和制度阀门。与此同时，世界依旧在三个方向上发展、运动。

1. 经济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旧的国际政治桎梏解除了，世界秩序的核心动力来自发展的需求和增长的竞赛，地理、种族、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不断被人们创造财富的欲望所突破，其结果是全球性生产链一再延长，给人们带来生活改善的机会与希望。

2. 技术现实化。众所周知，以计算机的大众应用和互联网的社会政治功能为代表，技术不再是少数人、少数国家的神话，而是成为世界性的物质和商品，成为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甚至会成为我

们这个星球能否平衡自身循环而继续存在的答案。

3. 安全的非常规化。尽管经济全球化、技术现实化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财富和技术便利的分配不均是绝对的，因此而失落的群体同时在增加。无论是阿富汗的难民、巴勒斯坦的工人、索马里的海盗，还是亚马孙部落的原住民，都在以个体的或有组织的方式抗拒世界秩序的不公。此外，商业利益与技术支持的结合，同样可能造成道德上的短视行为，给人类带来近至生理和环境、远至物种和生态退化甚至灭绝的威胁。

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大趋势。然而，这些趋势不再是国家意志使然，跨国公司、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传媒和各种以宗教、政治和经济主张为背景集合在一起的反抗力量快速兴起，正在很大程度上牵动着国家行为，影响国际体系的运行和走势。目前，主导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似乎还是国家行为体，但从根本上讲，全球秩序的基础已经在变化，国家的力量愈显不足，客观上必须顺应这一变化，服务于这一变化，才能进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由此预见，对未来世界制度的思考只能有三个出路。

1. 合作主义。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最终服从的是市场引力而非其他的政治因素，而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开放与合作。因此，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原有的国家权力是破坏性质的，它要求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降低自身的利益，与市场、民众的利益趋同。在冷战的藩篱去除后，国家以政治和主权安全控制经济行为的合法性被进一步削弱。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他同时谈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0年来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说到底就是顺应了对外合作，包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部分学习这样一个道理，也充分地表明只有通过合作，一个国家和民族才能获得机会，才能争取市场，才能寻求双赢的结果，才能最终获得安全而不为世界潮流所抛弃。

2. 多边主义。在合作的过程中，国家有如个

人，存在着控制目标的惯性和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偏好，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单边或双边选项较于多边框架对国家更具吸引力的原因。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的时代，一己之力已无法解决各国所面对的各种内外挑战。回想起来，当人类站到21世纪门槛的时候，多边主义的声音还是那么微弱。主导世界政治的某些西方大国依然沉浸在“历史终结”的错觉之中，浑然不知其“天定使命”已在时代更替之后同样面临终结。“九一一”事件以来的8年，单边主义行动和政治与军事的“神圣同盟”无一逃脱失败的命运，并且在伊拉克、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持续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联合国原本是战后西方发起以确保国际秩序稳定的国际多边机制，如今却由于受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挑战而日益被西方国家冷落、旁置甚至质疑。与之相关的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遗留的机制，因不能反映当下国际经济力量的新格局，迫切需要改革其制度、组织构成和权力及义务的分布。与此同时，各种区域性、功能性的多边制度安排却在实践中获得极大的发展，亚欧合作、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峰会等等都打破了旧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界限，成为国际多边机制发展中的新亮点。可以确信，在经济全球化、技术现实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已无法由若干大国或大国集团来主宰。在处理各类的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单边或双边的能力已远不及广泛的多边行动。如果说全球化更是一种多边制度建构过程的话，那么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无疑是通过参与、影响和贡献来获得建构主动权。

3. 和谐共存的理念。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世界的原本，世界因为需要解决矛盾才获得了进步的持续动力。但是，人类对于解决生存、发展和安全的矛盾却是在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获得正确认识的。比如，诺贝尔在发明炸药的时候没有想到它会被用于战争和屠杀的可能；人们在高速工业化的同时，一度忽略了资源和环境的长期代价；苏联在获得与美国在全球竞争的超级大国地位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却为日后的国家解体埋下了伏笔；布什政府为延续“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不惜血本推进中东民主计划，却导致美国今天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极端困境，等等。这些事与愿违的教训告诉我们，本体与客体的差异永远是存在的，而认识客体的唯一正确途径是允许它的存在，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话说，叫作“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不用自己的好恶作为判断外部世界的唯一标准，而是用包容的心态对待，用了解的办法改进智慧，进而采取正确的行动。因此，无论是美国的模式、欧洲的经验、日本的方法，还是拉美的特性、非洲的处境等等，未来的世界制度都必须加以涵盖和兼容，否则便无法应对来自全球各地的、多元的、非常规的和非国家的安全威胁。

（二）新兴大国的作用及策略

1. 人们对大国的定义可以千差万别。在我看来，其最终，恐怕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市场容量。新兴大国的潜力一方面在于充分发展巨大的内部市场，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外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其制度的兼容性与合理性必然随竞争而加速改进，同时也因其特性而产生巨大的创新冲动。这些必将对世界经济及其制度重构带来重大影响。特别要提到的是，新兴大国在争取更大的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必然要承担一定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如何依据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来“量体裁衣”，为国际社会提供既有特色、又符合自身能力的公共产品，是新兴大国无法回避的战略问题。

2. 国际体系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必定充满着大国之间的利益与智慧的博弈。新兴大国在双边定式中一般弱于现存大国，只能采取务实、灵活的多边主义外交策略，通过与各类多边

机制保持一定的制度衔接和相互平衡而获得持续影响力，最终通过国际制度的多元性来完成自身的全方位转型。因此，新兴大国应该比既存大国更青睐于多边主义原则。在实践中，如果“金砖四国”成员能够充分利用其互补优势，创造有效的合作制度，实现共同的结构转型，其国际秩序的塑造能力将是不可限量的。

3. 当然，多边主义的功效仍须以有效的双边关系作为支撑。为此，新兴大国应该构筑自身的友好国家体系。具体地说，首先应该搞好与自己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其次，对于既存大国在本地区的影响，不应采取简单排斥的政策，而是遵循和平共处、公平竞赛的原则，寻求双赢的结果比回到零和游戏更有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地区的稳定；最后，新兴大国还必须持续学习他国，特别是既存大国的制度规范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急于求成是不行的，而无所作为也是毫无希望的。中国和巴西都是发展中大国，同样肩负着开创新兴大国崛起崭新模式的历史责任。未来的成功只能依靠两国社会和民众的持续学习能力，依靠两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观念，也依靠我们彼此间宽容、合作与稳定的政策。

（作者为拉美所副所长，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巴西经济与世界格局：历史与展望

罗伯托·杜马斯·达马斯

（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巴西经济

巴西国土面积 854.7 万平方千米，人口 1.9 亿，2008 年巴西 GDP 达到了 2.89 万亿雷亚尔。从地域上来看，东南部的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和里约热内卢的 GDP 占全国的 50%，与中国一样巴西也需要大量发展内陆经济；第二经济大区是南部，包括南里奥格兰德州、巴拉那州和圣卡塔琳娜州。

20 世纪 70 年代巴西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致使债务大量增长。1973 年可以视作经济问题的开端，从巴西拖延债务一直发展到了 1982 年蔓延整个拉美的债务危机。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巴西处于不稳定状态，通胀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巴西的储蓄率低，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这与中国不同。

1993 年通胀率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最高时每天的利息达 3%。而雷亚尔计划颁布后，通胀率得到有效控制。70 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一直是巴西最头疼的问题，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只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大量印制货币，二是发行债券。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竞争力下降，面临诸多困难。为降低成本，企业不得不采取裁员等负面措施。巴西通胀率最高的几年也正好是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几年。因为当通胀率高涨时政府必然要提高利率，提高利率又使企业竞争力下降，所以整个经济也就随之下滑。事实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通胀率高涨时政府必然要提高利率来保证能够发行债券以保障政府的开支，而维持政府的开支又导致了通胀率的进一步高

涨。期间，政府缺乏投资资金，而是用各种方式寻求私营企业的投资。

1980~1994年对巴西来说是非常艰难的15年，其中的14年通胀率超过了100%，更换了6种货币，财政部长更换了14位，中央银行行长更换了14位，平均GDP增长2.4%。1994年，时任财政部长即后来的卡多佐总统提出了雷亚尔计划，采用平行货币体制来控制，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根据物价指数自动改变汇率。为了避免90年代的失误，巴西政府采取了降低进口关税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施雷亚尔计划以后，GDP增长远远超过就业和资本投入，说明巴西经济通过扩大内需使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通胀终于得到了控制。但是，巴西在汇率制度上也采取了一定限制措施。政府在1995~1999年期间采取的稳定货币和兑换控制体制使巴西经济经受住了很多外部冲击，如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使巴西放弃了固定汇率制。

2004年巴西的债务比率是47%，2005年时只有41%。国际债务负担也在下降，外汇储备达到了2000多亿美元。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货膨胀、国民债务和外债，目前都已得到缓和。

（二）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巴西经济

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使巴西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冲击。例如，大宗商品价格和需求下降对信贷产生了影响，另外股市和期货市场也受到了冲击。

巴西能经受住危机的冲击是因为其GDP主要构成来自内需，这与亚洲国家如韩国的出口型经济

不同。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其信贷占GDP的比率只有40%，正是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巴西能够抵御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巴西的银行比较稳定，不存在美国的次贷问题。巴西银行利率非常高，在做金融杠杆的时候成本会很高，金融系统因此非常健康。另外，中国成为巴西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即使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2007~2008年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非常快。巴西对中国的出口以铁矿石、大豆、纸浆等初级产品为主，但如今制成品已占47%。在此次危机中，巴西的优势体现在财政、外部环境、金融以及政府管理这四个方

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巴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了飞速发展，人文发展指数从1980年的0.68发展到2006年的0.81，体现了卢拉政府执政期间的收入分配趋好态势。由此可以看出，当通胀率高涨的时候，贫困率也迅速上升；通胀水平的下降，实际上对穷人来讲改善了收入，贫困率就降低。

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唯一的亮点就是中国提出的关于美元的未来地位问题。中国央行行长曾经提出用一种国际货币来代替国际储备的工具。当然很少有人认为雷亚尔能代替美元来作为国际储备。但是我们知道美元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储备手段，不仅中国的个人和政府，而且在很多国际投资领域都使用美元，所以我们很难让主权货币取代美元。中国有大量的美元债权和美元外汇储备，但因中国和巴西对对方的股票市场非常不熟悉，使得相互投资没有得到推广，在这方面两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为巴西论坛主席，Ita ÚBBA 驻华代表）

（本栏目责任编辑 刘维广）